

我刊「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將在今年刊載文章，深度討論如下議題：一、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自由民主思想對中國大轉型的啟示；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可能性 (而不是必要性，因為轉型的必要性已經眾所皆知了)；三、自由市場體系中經濟民主究竟有無合意性和可能性？歡迎海內外學者踴躍撰稿。

——編者

改革如何接力？

張鳴的〈中國改革的新十字路口〉(《二十一世紀》2013年2月號)一文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提出了改革接力的「三策」：經濟改革層面推進壟斷領域的市場化；司法改革層面回歸既往職業化軌道；政治改革層面強化人大民主與地方自治。作者認為，這「三策」是「新十字路口」處的光明選擇，但仍然存在黑暗前景，即超級權貴集團和地方官僚集團對改革的狙擊。

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反腐的短效性。以「反腐」接力改革確實是十八大以來的政治新風，然而「愈反愈腐」的歷史經驗和公眾認知抽去了這一路徑的進取根基。與其標舉《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這樣的歷史啟示錄，還不如高揚《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A Commentar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樣的政治憲法名篇，因為《八二憲法》不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是舊制度，它豐富而生動；改革本質上也不是革命，而是政體改良。中國精英不應將改革的「新十字路口」過份強烈地導向法國情境，而是需要吸收英美經驗理性。

張鳴的接力方案具有強烈的批評性游說痕迹，「三策」作為多數精英共識也可以，但筆者覺得在制度觀察與改革的邏輯完備性上尚顯不足。張鳴沒有討論中國的「行政改革」問題。中國近十年來的「法治政府」建設在依法行政、信息公開和民主參與方面均有所改善，「行政」吸納「政治」再反哺「政治」的經驗值得重視。張鳴也沒有在學理上深入討論《八二憲法》的「政治憲法結構」及其複合代表制問題。不廓清這一制度前提性問題，任何改革建言就只能是一種對經驗事實的直觀意見和背靠西方的移植性轉述。

中國改革的「新十字路口」需要斯密 (Adam Smith) 推進市場自由，需要潘恩 (Thomas Paine) 高揚人權，但更需要理性而節制的聯邦黨人群體進行憲制改進的優良設計，讓改革順利通過「歷史三峽」。

田飛龍 北京

2013.3.7

民族主義的虛妄與出路

正如伯林 (Isaiah Berlin) 論述民族主義經典的「彎枝」隱喻，背負着屈辱歷史和苦痛記憶的中國，在國家經濟軍事實力日漸壯大之時，一種洗刷恥辱重振雄風的非理性民族主義大行其道。非理性民族主義的狹隘和狂熱嚴重干擾着中國的內政外交。任劍濤〈釣魚島事件與中國民族主義〉(《二十一世紀》2013年2月號)一文正是對上述現象的深刻反思。

毋庸置疑，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民族主義因其樸素的國家認同和利益訴求有效凝聚和動員國人，推動國家獨立和統一，然而，民族主義內在的暴力基因和本質上的排斥性卻始終干擾着中國現代國家的理性成長。因此，如何有效「馴服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現代國家建設不得不面對的棘手難題。任文就此問題嘗試從學理上把脈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精神病灶，為馴服民族主義開出藥方，其中公民民族主義、自由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皆為有益的理論出路。

民族主義不僅是一個學理問題，更是一種政治行動。民族主義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

量，可以成為執政者實現某種政治目標的支持力量，這使執政者在內政頹廢時往往會訴諸民族主義，從而向外部轉嫁危機，然而，民族主義同樣可能轉化為質疑執政者的反對力量。因此，對任何執政者而言，利用民族主義實現某些政治目標並不明智，馴服民族主義才是對待民族主義的最好出路。

弓聯兵 青島
2013.3.7

維穩的東莞模式

維穩需要甚麼樣的思路呢？岳經綸和莊文嘉的〈社會公民權與社會穩定：「新塘事件」的個案研究〉（《二十一世紀》2013年2月號）一文通過個案分析，提供了一個具有操作性的「維穩的東莞模式」。通過對比作為鄰居的增城市新塘鎮和東莞市中堂鎮的差異，作者認為東莞市2007年以來的一系列社會政策改革給東莞帶來了一個包容性的穩定的社會。

東莞模式成功之處，在於其包容性的社會政策的改革，主要在社會保障、子女的平等教育權，以及本地和外來人口的協商和自治政策等方面，消除戶籍分割下城鎮人口的特權。只要是這個城市裏的人口，不管是外來與否，只要在這裏做工，都享有同樣的公民權利。這種「地域公民身份」可以為外來人口帶來認同感和歸屬感，也因公民權利的享有而帶來了作為主人翁的責任感。這些具體的社會政策在東莞的實施，為東莞帶來了穩定，沒有發生像「新塘事件」這樣的騷亂。

東莞模式給中國社會的維穩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思路。東莞模式的特徵是消解二元身份特權，趨向「合二為一」的社會，通過政策保障基本公民權利，從而實現社會穩定。

陳心想 美國
2013.3.1

經濟理性與政治情感

游宇、雷艷紅的〈「重慶模式」的經濟維度〉（《二十一世紀》2013年2月號）一文，雖然僅就「重慶模式」的經濟方面進行闡釋，但無疑引出重慶發展中經濟理性與政治情感的關係問題。作者並不諱言，意識形態與司法層面才是決定「重慶模式」成為「模式」的關鍵因素所在。文章旨在揭露「重慶模式」實為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具體應用，並無新意，且隱含各種危機。冒進的經濟政策無法令社會取得長足發展，也無法保障社會穩定。此皆為經濟理性角度的思考。

但「重慶模式」卻在短期內贏得社會廣泛關注，「唱紅打黑」響遍全國，此皆源自政治情感。民眾一般只會考慮與自身切實相關的，如就業、收入、治安等日常生活問題，往往根據表象做出判斷。「重慶模式」恰恰在此類事務上暫時贏得了民眾好感，其本身所隱含的弊病和困境及其不具持續性的內質，卻為人忽視。「重慶模式」帶來的經濟快速增長，給普通百姓短期愉悅和衝擊，以致對當時重慶當局產生出虛幻的政治好感。當然，其中不無官方的政治宣傳渲染所起的作用。這種政治假象最終必將被經濟理性所擊破。

作者或囿於篇幅，未及闡述「重慶模式」中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但其論理充分，相信對現實執政也將有所裨益。

郭輝 長沙
2013.3.15

瞬間的歷史

張寧〈「重慶道路」及其群眾基礎〉（《二十一世紀》2013年2月號）一文，對目前還處在「重慶道路」和「文革」間爭論中的思考大有裨益。張文提出不同於當下兩極之間搖擺爭吵的第三思路，給讀者帶來更多思考空間。

文中指出，「重慶道路」除了唱紅所營造的意識形態氛圍及打黑所營造的專政恐怖氛圍類似於文革之外，並沒有發生奪權、砸爛公檢法等典型的文革特徵；且通過群眾基礎分析，似也可把「重慶道路」和文革區分開來。但「重慶道路」和文革還有沒有其他隱藏的或被忽略的關聯呢？筆者認為：那就是最高權力掌握者（即文中所提具有「克里斯瑪」人格的強人）的獨裁。

文革看似是群眾奪權互鬥，實則群眾只是木偶，毛澤東才是背後操縱者。薄熙來的「重慶道路」看似是專政機關實行專政，但專政機關事實上也成了薄的木偶。故此，文革與「重慶道路」一樣，真正的主宰都是手握最高權力者。就這一點而言，薄和毛沒區別，「重慶道路」和文革沒區別。

鄭永福 北京
2013.3.12